



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
SHENZHEN CHARITY ALLIANCE

专刊

总第15期 2019年第1期

编者按 2019年5月10日，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举办“第六期慈善大讲堂”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担任主讲嘉宾，畅谈“儒家慈善观：理念与实践”。现将活动现场致辞和演讲内容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深慈联要成为弘扬慈善文化传统的推动者

——在“第六期慈善大讲堂”活动上的致辞

刘国玲

尊敬的康教授、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同仁：

今天，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在这里主办2019年第一期“慈善大讲堂”。我们有幸请来了中国公益界的大咖——康晓光教授。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深圳公益慈善界的小咖们。我或在这里说“小咖”，是因为在康老师面前，我们这些在业界很有影响力的深圳同行只能称为小咖。

今天出席的嘉宾有陈章联会长、高金德主席、钟礼银处长、马卫红院长。看到这么多熟悉的公益同仁，为精彩的文化大餐、慈善讲座相聚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在此，我谨代表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对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同行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成立于2016年，作为一个联合会，是服务政府、



服务行业的枢纽型组织和服务平台。我们极力打造五大平台，尤其是在弘扬慈善文化、开展慈善宣传这一平台。慈善大讲堂是我们面向公益慈善从业人员和市民传播慈善知识的慈善文化大讲堂，旨在推动慈善宣传、培养慈善理念。特别是在弘扬慈善文化传统方面，我们要做积极的推动者。慈善大讲堂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平台，成功举办几期以后得到很好的反响。

今天我们能够深圳大学举办这期慈善大讲堂，很感谢深圳大学给予的大力支持。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的“公益创新专才班”提出：“播撒公益的种子，助推跨界创新”，这样的思路与我们推动行业发展、提升专业水平有很多吻合的地方。我想，通过这样的合作，对深圳市慈善行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是文化方面的提升，慈善文化的提升；二是专业从业人员的培养和培训；三是市民慈善文化理念的树立。希望我们今后可以更深入的合作。本次活动，马院长和深大的老师同学们也亲临现场，聆听这节课，不管是在会务安排还是参与方面都给予了鼎力支持，在这里也请各位对深圳大学给予的支持表示最衷心感谢。

活动现场参与的各位来宾、同行中，有很多是深圳慈善行业里面很有影响力的秘书长、从业人员。今天大家带着学习的心态来到现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对康教授的敬仰。康教授日理万机，不仅要做学术研究，而且对很多慈善组织的发展给予指导。对于成立不久的深慈联来说，有人说能把康教授请来演讲，我们很了不起，但我觉得是康老师很了不起，大家要珍惜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家文化则是中国慈善文化的根基之一，博大精深。中国人民乐善好施的传统，能够得以弘扬至今，正是因为有儒家文化思想，深刻地影响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如何把这些传统的思想文化跟我们现代的公益慈善理念更好地融合起来，我觉得康教授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能给予我们这方面的理论支持，对于我们各个慈善组织来说，乃至对深圳整个慈善行业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如何去传播传统慈善文化，如何创新开展慈善活动，我想今天的这一堂课会给我们非常好的启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普及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宣传慈善典型，我们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也正是在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同时对于提升深圳整个慈善行业水平来说，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我们每一个从业人员，我们自己的文化提升，相应的组织机构的文化也得到了提升。一个有文化底蕴的组织，它的生命力才是永恒的。所以今天这一堂课，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好好珍惜，好好学习。

在这里再次感谢康教授，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学以致用并广泛传播，谢谢大家。

刘国玲 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秘书长

儒家慈善观：理念与实践

康晓光

首先感谢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还有深圳市民政局、深圳大学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与各位朋友进行交流的机会，也感谢今天的各位朋友，能够远道而来，进行交流。更多的感谢我就不说了，我就围绕着儒家的慈善观，从它的理念到实践，跟各位朋友做一个简单的现场汇报。

今天来之前，我就在想如何介绍儒家的慈善观，因为这个讲座很开放，既有我们公益的同行，也有管理部门的领导，还有深圳大学的同学们、社会的公众，所以我选择的方式，一方面尽可能梳理慈善观的一些理念，另外将谈及一个明末中国大思想家——高攀龙，在他的一生中，慈善的实践也是特别丰富，做得也非常好，其研究相对来说也比较充分，所以我也想介绍一下这个人的一生，还有他的慈善实践。

当我们讲到慈善事业，今天说慈善也可以，说公益也可以，实际上价值观尤其重要。什么叫慈善？什么叫公益？古今中外各种定义也比较多，这些定义也有分歧，但是无论哪一种定义，无论哪个时代、哪个文化观，有一个



共性是非常一致的，也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利他。不管慈善怎么讲，公益怎么讲，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一个利他的事实。当我们说某一个人做慈善或者做公益的时候，基本上说他做这件事的出发点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且实际的所作所为的结果是要改善其他人的利益，同时自身的利益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要承受一定的损害，这一切都是自愿的。

价值观利他行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与利他相对的是利己，利己这件事情，你不用去劝说，不用去鼓励，这是本能。生命在几十亿年的进化当中，要想生存，就得竞争，如果连自利的冲动和本能都不具备，生命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存在到今天。所以围绕着关于一个人自利问题，我们不用太操心，不用说服他，一个社会中很多建制主要还是用来限制和遏制人的自利冲动，不要让他过分，不要让他胡作非为。但是关于利他就不一样，利他社会一定要有一套主流的价值观，或者要有一套说法，我们讲的文化，即价值观、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等，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是与非、对与错、应该与不应该等等。这样的一套说法给利他行为给予充分的肯定、鼓励和表彰的情况下，这个社会才会出现大范围的利他行为。关于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亲身的体验，不用深入思考，就可以有所领会。所以当我们讲到利他行为，讲到慈善、公益的时候，一定需要这个社会从文化整体和主流上肯定他、锻造他、鼓励他，否则利他行为很难出现，即使零星、偶尔出现，也绝对不会成为大范围的慈善公益事业。

当我们讲到慈善的时候，价值观的问题非常重要。中国现代慈善从70年代，1976、1978年以来经过了四十年的发展，各方面发展得非常迅猛，发展得也很好，然而到了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任务，就是文化的建设、价值观的建设。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乱象，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和这个领域中价值观的不清晰、价值观的混乱有密切的联系。价值观的混乱、不清晰和多元化不是一回事，多元化并不一定代表混乱，而且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文化是纯粹的，肯定是和其他的文化交流、碰撞并且在融合当中赢得自身的发展。所以如何面对多元化，在多元



化的过程中重建自己的主流价值，这是要回应的问题，而不是拒绝多元化。

我们今天会探讨一些问题：对于我们现代和未来的中国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来说，支撑我们得以立足和前进的文化资源，究竟应该来自哪里？我们如何去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古典、传统的文化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这是今天要给各位汇报的一个思考主题。

我进入慈善公益领域有二十多年，参加过培训，也培训过别人，最主要的还是在接受西方自由主义公益价值观、公益实践的方式方法等等。很多人也认为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价值观，佛教的、儒教的都太古老，几千年前的东西已经不适合现代的生活，认为它不足以支撑中国现在的慈善事业。对于此，我也在思考，怎么样能创新，怎么样能在国际上应用。

我从高攀龙切入，简单探讨一下高攀龙的慈善。然后我稍微具体一点介绍一下高攀龙的慈善实践，高攀龙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是哪一些观念、学说、理论、价值观在驱动他做这些慈善事业，以及他是怎么做的。随即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在现实的、世俗的层面，儒家哪些思想在支持高攀龙。高攀龙的思想是他个体的思想，但是那个思想就仅限于他个人吗？显然不是，他是儒家的慈善，是儒家的思想家，所以他的思想背后有儒家的思想体系，我们来探讨一下儒家的思想体系与公益慈善的关系。

儒家确实不认为生命是永恒的，他认为有生就有死，但是儒家也有一套超越死亡理念，一套人生实践的模式。我们都知道，宗教对慈善的激励是很大的，那么儒家的思想中，有没有这样一种类似于宗教的理念和精神在激励人们，我个人认为是有的。儒家虽然不相信，肉体不会永恒，甚至灵魂也不永恒，但是儒家追求自身价值，追求一个人在身前的这些贡献，对身后、对子孙万代产生各种影响，并且通过这种影响让自己活在人们的心中，活在民族和人类大舞台当中，从而获得永恒，不是个体生命自我曲解的永恒，是通过把小我融入大我的一种不朽。所以对这样的一些追求，实际也是非常有利于激励中国儒家士大夫做一些我们今天做的利他的事业。

我们先来看一下高攀龙，他生活的时代是明代末期，明代是非常有意思



的一个朝代，明代经济发展是非常繁荣的，但是到后期，政治上的腐败、社会上的分化、贫富不均，外部异族入侵、内部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可以说到最后也是分崩离析的状态，高攀龙就生活在明朝最后那个阶段，黎明前这段时间，高攀龙他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他是进入了正史的人物，就是政府编的文史，能进入正史的人物是很不容易的，这里对他的评价“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高攀龙的身世还是很奇特的，他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他的祖父高材，高材有个弟弟叫高校，高校膝下无子。高攀龙他原来不叫这个名字，他的生父是高梦龙，他出生以后，他的爷爷就把他过继给自己的弟弟，所以他就跟他爸爸平辈了，所以他的名字就叫高攀龙。但是他的生父高梦龙去世以后，高攀龙还是按父子的关系行孝，这点他自己把握得非常好，而且他父亲对他们也很好，他的生父有七个儿子，所以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把他的遗产一分七份，也有高攀龙一份。但是高攀龙由于继承了养父的财产，便说这份财产就不要了。所以高梦龙还是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在送葬的时候，高攀龙也是以儿子的身份给他生父送的。他在具体的礼节上可能没有必要做，但是他从人情的角度上做了这么一些安排，还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高攀龙从他祖父开始做县令时，家道渐富。大家可以看到，他家里是从事经商的，但是主要还是典当和放息，所以他家族是非常富裕的，是当地有名的一个大户。在他的养父去世的时候，他家里还很富有，所谓的亦儒亦商这样的背景。因此高攀龙自杀时候是在家里躺着，在他家里一个非常大的院子，里面还有一个池塘，亭台楼阁都有。

高攀龙他从小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不但祖父亲自教授他，还请来了当地的名师给他辅导。高攀龙20岁的时候中乡举，而且由于他们家的势力很大，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商界都非常有影响力，所以那个时候他一个小小的举人就可以得到相国的赏识，相国认为他可以成为“天下士”，对他的期待非常高。25岁的时候，他开始得知顾宪成讲学，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本身



非常勤奋刻苦，他对自己是非常严格的，严到什么程度？每天把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个年代从修身、自我培养、自我养成方面，列为“功过格”，像一个小格似的，比如说我们本科生，有可能做了好事和坏事，这个作业本上像选答题式的，都列好了。他自己每天给自己做一个评价，打个勾，然后好朋友之间定期隔三岔五的在一起交流，看看跟上个月，跟去年相比，好事是不是做得多了、坏事是不是改得多了，在一起互相监督、互相激励、互相考核，就像现在流行的好事做了多少、学习了什么东西，天天在这儿打卡。虽然他家里非常有钱，也非常有势，但是他对自己要求是非常严格，不是纨绔子弟。

和所有儒家士大夫不一样，高攀龙读书也要出仕，一方面说当官可以有权有势，可以有仕途等等，但他还是要实现自己最终的理想：治国平天下。但是高攀龙的仕途非常坎坷，因为他那个时代本身就非常动荡，朝廷内部的权争也是如火如荼，非常残酷、非常血腥。高攀龙这个人又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而且他不想置身事外，他想积极参与这个事情，所以他也卷入了权力斗争，但是他这一派没有实权，但是名声很大，在朝野影响也很大，所以这些权贵轻易也不敢动他。他一直卷入阶级斗争当中，而且他本身在学术上也是非常著名的。

明末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斗争还是很激烈的，顾宪成是站在理学这派，他对心学不太感冒，而且他主张不要整天搞禅宗那些东西，不要搞这些虚无飘渺的，要实实在在、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去学习，身体力行去实践，把学习自用、报家报国联合起来。而且高攀龙对学问特别有判断，他的好朋友顾宪成就说：你一个读书人，如果有志，必须要积极追求于救世，解决现实的问题；你如果想来拯救这个世界，想来改变不好的东西，肯定是跟现实有冲突的，因此你就不要怕牺牲一些东西。高攀龙就说“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为什么呢？“政事者存乎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学术正，则心术正，心术正，则生于其心发于政事者岂有不正乎？故学术者，天下之大本。末世不但不明学且欲禁学，若之何而天下治安也。”到了末期，死到临头的时候，不但不允许你好好教学，不允许你正常生活，甚至不允许你思



考，所有的人都不要思考，这么一个人就废了。

我们再看看这样的一个儒家学者，这样的一个大利者，他在民间做了一些什么，明末时的忧国之士多有改良社会之志。特别是高攀龙他没当官，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做什么？他不能出仕，不能作为政府的官员来治国平天下，他作为一个绅士，一个有影响力又有财力的人，在乡野里是怎么发挥他的作用？慈善和讲学，主要是这两个方面，这是他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看高攀龙的善举实际覆盖了多个面向，我们罗列一下。他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亲友以生计相托者”，高攀龙他会极力代筹，甚至捐贖践约于宗亲。“于宗亲，有养之终身者，有及其再世者”，就是同一宗族的这些近亲、远亲，谁家有了困难，他可以养老送终，甚至下一代也帮忙救助、帮忙抚养，及其再世，再世是下一代。对于自己的老师，他是养死殓之，就是生养死葬，送葬他也都是来的。对于朋友，有什么困难的时候，需要他帮助，他都是帮忙的，甚至朋友的儿女、妻子，他也都来关照，这方面高攀龙做得非常好。

然后有人出去参加科举考试，到外地留学，只要他认定这个人在这方面是有出息的，而且还有积极的追求，都是大力资助。这方面他资助了非常多的人，有的人进京赶考，连续几年的钱都是他在支撑。然后地方上有大是大非，这个大是大非就是需要朝廷说理，需要给做出判断的时候，像高攀龙这样名高位重的人，都会被选中，所以他参与了很多包括不同宗族、家族之间大的土地纠纷。

再者就是大饥荒的时候，组织乡绅赈灾、施粥这些方面他都做了很多事情，而且高攀龙不仅仅是出钱，还做事。高攀龙他敏锐发现问题，他要判断谁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还要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要把当地这些同样人物组织起来，把钱、物、人都给汇集起来，然后再去解决这个问题。尤其在大饥荒面前，这些虽然是临时性的一些救助活动，但是组织化的程度也是很高。在这一方面，乡绅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地方官也跟他们合作。明末有一本书《行善的艺术》，各位可以看一下，美国韩德林写的，已经有翻



译过来的译文。这里面就有相当的篇幅讲了高攀龙，参与他们当地大规模的赈灾活动，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高攀龙参与这些应急事件的同时，他就积极从事劝善活动，还成立了同善会，这个同善会是非常完善的，跟我们现在社会组织、协会、社团差别不是很大。

高攀龙在这个方面，是超越了家族的慈善，他创建了无锡同善会。1614年，高攀龙与刘元珍、陈幼学、叶茂才等创办了无锡同善会。古代人做慈善非常有意思，他做慈善是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做慈善，他认为做慈善这件事本身就是我们的幸运，然后大家聚到一起，实际上是进德修业，因为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会教，但是同时自己进德修业。他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们这些出钱出力帮助别人的人，然后对需要帮助的人做的实际是两件事，一是扶贫济困，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教化，传递这些价值观、伦理道德、生活技能。因此他认为教化与赈济是并重的，而且他认为受益者不仅仅是被帮助的人，最大是他们自己，就是我们所谓的聚集起来帮助别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看同善会的制度、规章，他们做的事情，也可以体现出这两点。

宋代范仲淹的价值前前后后持续了几千年，高攀龙很尊敬范仲淹，但是他最终的慈善事业超越了范仲淹。也就是说，他的同善会已经非常接近现代这样的一个慈善理念。第一，它是一个成型的组织；再者，它超越了宗族，是以社会为单位的，血缘关系不大，从组织者来看、从提供帮助的人看、社会来看，受血缘的影响非常小，而且它是常规化的、地方化的。

我们看同善会的会规，他说我们这个会名叫同善，每一届主持会务的人，无论你有没有爵位，有没有身份地位，有没有官衔，不论这些，只要行为和品德得到认可，大家公共的规矩能够被追及上，就可以了。然后就是如何开会，“司讲者用通俗语言，不烦文采，务使人人易晓，感动善心。”每次同善会的活动会提及两方面：一是自我教育，二是教化公众。而且他要求要用通俗的语言，即白话。然后他讲会费是多少，怎么缴纳，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社团，志同道合的社团。这个社团非常有意思，他是公共推举，而且是轮值的，也不是用你的权力和身份来决定的，



而是靠你的道德。还有非常有意义的资助，我这里摘取了一些，你看他们资助的这些标准，都有明确的一套规定，第五条对资金怎么使用规定得非常清晰，而且简单明了。他说“其他一切穷民，力难遍及”，这些顾不过来的怎么办，就如何如何处理了，会议商量之后，给点小钱，不用这些流程。但是他规定什么人不给，所有的古典慈善都是这样的，不光中国，它是用道德标准来衡量的，比如说我是否救助你，不是你客观上有没有困难，你穷不穷，不是的，还要看你是不是一个好人，你要是一个坏人，穷死了我也不救你，他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他说“至于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力强壮、游手游食以至赤贫者，皆不滥助”。但是现在社会就不是这个原则，比如说低保，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你的家庭收入，所以你品德好不好，是不是得到表彰，还是说合乎行为，都不管，但是过去还是非常明确的。

这边还有很多，包括信息公开等等，程序性的程度还是挺大的，这里道德教化的属性也非常突出。这句话说得特别好，这是陈龙正后来在记录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向有同善会，名周贫人，实劝众人”，也就是说，他在做慈善的时候，教化的功能是特别特别强的。其实是想以乖劝善之义，“哀鳏寡，恤孤独，行善于乡，所以推广仁术也”，特别强调教化，文化的建设。

当时高攀龙在推行教化的时候，也非常讲策略性，他非常认可明太祖朱元璋的十六字方针，六言，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核心价值观，当时他规定“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里都是一些儒家流行的，主流的，对普通老百姓行之有效的一些道德讲法。所以同善会在进行民间教化的时候，主要就是围绕这六条，把它具体化、生活化，把它落到实处，就是这么来做这些事情的，因此济贫也是他劝善的一个途径。

总而言之，从同善会的会训、章程、历史记录，同善会的实践来看，儒家的仁爱思想是贯穿始终的，指导他们最核心的价值观就是这样一些仁爱的思想。我们就不一一去阐述这些东西了，重要的是先来看一下背后系统化的一些思想是什么，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探讨儒家的思想，儒家关于慈善的思想是怎么回事。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文化对于慈善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儒家怎么讲慈善？实际上，我们如果去看儒家的四书五经这些经典，你会发现他讲慈善这两个字很少，专门讲利他更少。无论是古代的慈善事业，还是现代的公益、慈善角度，这些专业术语的角度，你会发现儒家谈得非常少，他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相比，讲得最少。我当时研究这个的时候，为什么儒家讲这些东西很少？是儒家认为这些慈善不重要吗？是儒家不关心慈善吗？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通过一些探讨，我们可以明白不是这样的。那么儒家是怎么理解慈善的？儒家认为人这一生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已经完全包括了今天我们讲慈善、讲公益的很多核心内容，而且这些东西就和人的一生，整个美好社会完全的、有机的、全面的融合在一起，没有必要单独拿出来，不可能把它单独拿出来讲，单独拿出来讲反倒把它讲小了、讲低了。儒家的人生有他的理想社会，他的人生本来就是和利他分不开的，我讲完了以后再讲这样的一个总感受。

我们来看看，儒家怎么看待利他？儒家与利他有关核心理念是什么？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人性，儒家对人性的理解，他认为人性善，这个善也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善，是仁爱的“仁”字。人性中“仁”这样的一种本质是哪儿来的？古典文学认为这是天赋的，天命，是天赋予人的。在古典儒家的心目中，至高无上、无始无终的、创造一切、滋生一切的就是道，或者是天，抽象的这样一个概念。天道的本质就是“仁”，所以我们讲天人合一的时候，那个“一”是什么？就是在天为道，在人就是性，天道跟人性，天道跟人性一致的东西，合为一的东西，那个一就是“仁”，就是这个字。

为什么说天道的本质是“仁”？这和我们中国人古典的思维方式有关，刚才讲到仁的时候，古代字形的变化跟现在差别不是太大，就是“仁”。所以讲到仁的时候，他是表示两个人，所以他不是个人主义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不是以个人为单位，他一开始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联结，“仁”本身在古汉语里面有相通的意思。比如说麻木不仁，就是说你没有感通，你和某些事情之间没有感通，这是麻木不仁，所以仁本身就有感通，仁就有相



亲相爱的意思，所以“仁”与生俱来有一种本能、一种潜能，能够彼此感知自己的喜怒哀乐，而且通过这样一种相互的感通产生一种相亲相爱，这是仁的本质。

那么人和人之间的爱，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爱，父母对儿女的爱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生养，就是父母生养儿女。所以当他这么理解人和人之间的爱，理解爱的意识的时候，理解仁的时候，古人观察天地的时候，用的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来看，他觉得天地就是父母，天地间的万物，包括我们人类都是天地生养。所以要去问天有没有道？有道，天道，天有没有德？如果天要有德，天就是仁爱的最高境界，生养万物，而且只给予，不索求任何回报，而且从不自吹自擂。所以天是父母和夫妻关系最高的境界，就是最好的。如果天道有本质，天地有大德，那就是生，这是《易经·周易》里的话，“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所以生养就是仁爱最高、最核心的东西，古典儒家认为这种最美好的德性，在创造人的时候赋予了人，所以人有一种爱人的本能、潜能。但是他不是说人只能做好事，不做坏事，否则就不需要教化了，就不需要礼乐刑政了，所以他还是需要。孟子有句名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与畜牲的区别就那么一点点，绝大多数方面下，人和畜牲是一样的，人和畜牲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人有礼义廉耻四端，所谓的侧隐之心、是非之心等等。

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儒家讲，人为什么应该爱“仁”的时候，仁的本性是什么？不重要，我们关键理解古典儒家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他首先要确定人性中有美好的一面，其次他为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找到一个更坚实、更高的依据。这个依据是什么？就找到天，所以“天命之谓性”，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是老天赋予的。老天为什么会把美好的一面赋予人呢？因为老天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把美好的一面给了人类。这是古典儒家关于人性论的论述，有这么一个说法。

《论语》里解读仁的时候，一个通俗的解释就是仁者爱人，问题是怎么去爱人？在这一点上，孔子他非常智慧，他没有具体的说你应该怎么爱，给



他吃什么，穿什么，应该给他教什么，不是这样的。孔子在这个方面没有发表意见，如果在这方面讲得太多实际上是有麻烦的，因为时代是不断变化，这些认为也在变。孔子非常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两个原则，从方法论上，行仁之方的两个原则，就是我们讲的忠恕之道，这个忠恕之道是什么？敬己之谓忠，他讲“忠”的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从积极这方面讲，你想要的好东西，你也帮助别人去实现。“恕”主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具体的说“己欲立”“己欲达”到底是什么？这个具体还没有规定，所以己所不欲，不欲是什么？他也没有谈到。这个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去斟酌。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爱人如己，把它统一起来，这是他的行仁之方，怎么样把爱人的东西落实到生活当中，落实到行动当中，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中国人讲仁爱的仁，讲“仁”的时候，先天的就把自己和他人放到一起考虑，作为一种不加思索的、一个先入为主的预设，把它纳入进来了。你如果是一个人，如果把美好的本性发挥出来，或者按照最美好的本性去思考行为的时候，就不能只考虑你自己，你就要考虑他人。而且怎么考虑他人？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个过程中，这种利己与利他实际上是融入进去的，就没有必要额外再讲利他。就是关心别人的福祉，对别人怀着深切的同情，并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让得到者都从中受益，它是儒家一个最基本的理念，贯穿到一生的实践当中，所以没有必要额外再来讲利己、利他这些东西。

那么仁爱 and 博爱是什么关系？孟子讲了一句话，推己及人，他讲得很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里面仁爱跟博爱有什么区别？仁爱是讲的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有一个由近到远的过程，而在这当中他是亲疏有别的。对于古代儒家来说，一个人虽然让自己的父母挨饿，但他帮助了其他人的父母，可能今天有的人、有的机构会表彰他，认为他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等等，但是古代不能，这就是十恶之一，是重罪。他的原则是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你要先把自己的父母亲照顾好，有余力你再去照顾别人的父母，而且



你也应该去照顾别人的父母，当你爱自己父母的时候，你也要想别人也有父母，他的父母也应该得到更好的照顾，所以当你照顾好自己父母的时候，你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他有一个顺序，他坚决反对自家父母没照顾好去照顾别人家父母，这个不是伟大的，是不被认可的。所以《唐律》以后有规定，你检举父母，到官府去举报父母，如果举报错了就砍头，如果举报对了，父母判罪，你跟父母一样判，因为你也犯了一个罪，不孝罪，但是你的举报罪有效，查实了，你父母确实犯了，父母被判罪，但是有的时候，作为举报父母的人，可能你的罪比父母判得还重。所以讲亲疏有别，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孟子讲的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第一个亲是动词，第二个亲是父母和长辈，仁民的仁，仁是动词，爱物的爱也是动词。我们可以看到亲的内涵、仁的内涵及爱的内涵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下面可以再讨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推己及人，当你的境界、你的能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以至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时候，这时候仁爱就等同于博爱，所以仁爱不断地在扩展、发展，可以获取博爱的效果，但是仁爱 and 博爱还是有区别的，他讲究一个先后、远近、缓急这么一种差异。

“大同”是儒家的一个理想，实际上我们看“大同”理想，他和现代的社会保障、福利国家，好多东西是非常一致的。“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等等，这些理想社会实际上把公益和慈善的理想都已涵盖，他认为很多社会致力于追求这样的一个东西。无论今天讲的狭义的慈善公益，还是现代的慈善公益，包括最近西方福利国家的理想，与这里面的要素都是相通的。

我们在看《大学》的时候，《大学》实际上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理想、人生规划，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一个读书人最理想的人生目标，有一些阶段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大学》。《大学》是一个总体性的规划。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纲领八条目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就是人生的三纲领，



但是这三纲领，它是有内在联系的。“明明德”是实践，第一个明是动词，第二个明是形容词，简单说，我们能够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自己达到道德的觉悟用来做什么？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亲民”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新民”，就是改变别人，让别人也来“明明德”，大家都“明明德”。所在这个里面，推己及人，自己“明明德”，尽可能影响到别人都来“明明德”，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止于至善”为止。

那么怎么样能够实现人生三纲领呢？他提出八个步骤，或者是八个阶段，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八个阶段，我们能够做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以修身为界，可以说前面这些，一般是内圣，内部自己达到思想和修养方面圣人的境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所谓的外王，就是“亲民”的一个过程。简单的说，“明明德”对应的是修身之前，“亲民”对应的是修身之后，庄子把它概括为内圣外王，这是人生的理想。

我们看《大学》里介绍的人生理想，那是什么？也就是说，过去讲一个读书人，一个君子，成功的人生意味着什么？成功的人生不仅仅内心有一个好的境界，一个良好的道德修养，更重要的是你个人的成功，不仅仅是修身齐家，而是治国平天下，你给他人，你给社会带来了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人生绝不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自身利益满足最大化为标准，而是说你一定要和他人、和社会，甚至和越来越多的他人，越来越久的年代，跟他们结合起来，当你给这些人造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是成功。所以我们会看到，利他造福社会，他是成就自我，既是一个必由之路，也是一个题中应有之意，这点是我们一定要看出来的，你救自己、谈自己、为自然的家庭创造幸福，不是什么大的成功，他认为你至少不是一个君子的成功，只是一个小人成功。

《论语》里面，子贡和孔子有一段对话，子贡是非常富有的，孔子的学生中最有钱的学生是子贡，子贡对同学、对孔子的帮助也是特别大，经常周济同学们，孔子周游列国，估计很多钱也是子贡出的。孔子直接表扬子贡的



时候很少，我估计这段话是子贡求表扬。子贡说“老师，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今天说这个人仁，那个人仁，怎么从来不评论我？孔子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有点偷换概念，子贡讲博施济众，并不是说普天之下，孔子把博施济众换成了普天之下，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一个人如果能对所有的人做到博施济众，岂止是一个仁者，你是一个圣人了。“尧舜其犹病诸”尧舜都做不到，都不能完全做好这些事情。这是整个《论语》唯一一次孔子对仁做了一个普遍性的定义，“夫仁者”，其他地方解释仁的时候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只有这一次，他是一个普遍性的，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且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就是行仁之方，这句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什么叫仁者？在孔子心目中，仁者不是非常非常大的，你只要尽心了、尽力了，就是大的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你做到就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行了。但是圣王不一定，圣王很多博施济众，所以他把利他和造福社会分了不同的境界，但是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并不是说尧舜做了那么大的功业，就如何如何高，那颜渊的地位也非常高，颜渊做了什么？颜渊什么也没有做，他就当了一辈子的学生，然后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饮，过得惨不忍睹，最终40岁就夭折了，你说他有什么功业？没有，但是他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讲修齐治平，但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现代好公民，把自己做好，家里管好了，儿女的身份、责任尽到了，把自己做父母的责任尽到，积极参与公众事务，参与政治等等，我们就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必要说我非得当上总书记才是平天下。首先我们对总理、书记也是一样的，不是说只有在这个位置才是平天下，而且人生的境界，你的成功是背离的，但是你的本质应该是一样的，论语里的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就是讲的人生，一个君子，你是否成功有三种境界，但是从君子的修养来说，这三种境界，对君子的修养没有差异。



最成功的境界即君子人生最理想的境界，“学而时习之”。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不断学习，或者用《大学》的话，我们可以明明德，“时”是我们有那个运气，得到了机会，可以做什么？可以亲民，可以治国平天下，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习”就是实现你的理想，你去把你体会到的落实到你的生活和实践当中，这就是“习”。“学而时习之”是什么？我们能够探索，我们有机会去实现，我们找到了人生的理想，就能机会去实现人生的理想，这是一个君子最幸福的境界，所以是“不亦说乎”。

那么没有这个“时”不能习的时候怎么办？转而试之，就是“有朋自远方来”，毕竟还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可以同声相应、同声相求，在一起相互激励，不多，有朋友远方来，虽然密度很低，但是也很好，所以他说“不亦乐乎”，“乐”要比“说”层次低得多。

最惨的是什么呢？不但没有机会去实现你的理想，也没有人来理解你，甚至你还是被误解，被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人不知而不愠”，不怨天尤人，穷则独善其身，还得坚持自己的君子。所以孔子说，这不也是顶天立地的君子吗？不亦君子乎。但是无论是“学而时习之”，还是“有朋自远方来”，还是“人不知而不愠”，对于君子个人来说，没有变化，变化的应该是外在的环境，还有他实现的业绩，区别是在这里，但是君子本人不应该有什么变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人生都是一样的。他相信人的本性中有爱人的这一面，而且儒家相信这些是天赋。

那怎么去爱人？忠恕之道。忠恕之道对于一个完整的在社会和国家中生活的人来说，从内圣到外王，从修身齐家一直到治国平天下。在我们看《大学》思路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受得到，实际上，成己之道和成仁之道，利己和利他，它们没有什么界限，没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融为一体的。

我们最后看一下，在死亡面前是怎么回事？我们看高攀龙，高攀龙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壮怀激烈的，高攀龙和顾宪成、顾允成，顾宪成和顾允成是兄弟，他们当时为了对抗朝廷中的权臣，决定恢复杨时当时创办的东林书院。东林书院我们都知道他有一幅特别有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



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个对联非常著名，高攀龙和顾宪成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也本着这个精神，决定恢复东林书院，东林讲学，通过讲坛汇集天下志同道合的朋友，议论朝政、通其时弊，提出他们的建议。一时之间东林书院名气非常大，对民间和政府都有重大的影响。

当时他斗争到最激烈的时候，就是天启四年，当时权倾天下的大太监是魏忠贤，魏忠贤活着的时候被称为九千岁，皇帝是万岁，他是九千岁，当时满朝都在给他拍马屁，建生祠，就是活着给他建祠堂，建了六七百所祠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顾宪成和高攀龙弹劾他，绝对就是以卵击石，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权倾天下，他可以称九千岁，这种情况下，高攀龙弹劾他，魏忠贤还算可以，比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强多了，尽管他有这么大的权力，顾宪成和高攀龙等等忠义大臣抨击他，刑部告他、吏部告他，皇帝那儿告他，他还没有立刻去打击报复。最后这个过程很激烈，打击他的两个死党，其中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细节我们就不管了，最终皇帝同意了，魏忠贤让他的死党，也是高攀龙重点打击的那个人，来抓高攀龙。东林六君子，此前已经惨遭杀害了，而且受尽酷刑。

二十六年的时候，魏忠贤派人抓高攀龙，因为高攀龙家里有权有势，所以一路抓捕他的人不管走到哪，都有人不断给他通报，让他提前得到消息。高攀龙得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有个学生让他跑，他说没有地方可跑，不跑。他的一生是非常崇敬屈原的，他说我要效仿屈原来面对这个事情，他也不是置之度外，他实际上内心已经做出了安排。他先到南祠拜访了创办东林书院的杨时，他向东林书院道别之后，回家跟几个弟子在他家的大后庭院饮酒，他最后说：“吾视死如归耳！心同太虚原无生死，何得视生死为二？看临死转念，便堕陷落崖，不是立命之学”。3月16日，传来明天他们就要来抓捕，这个时候高攀龙留下了几封遗书，对不同的人都有交代，最后也给皇帝写了一封信，他说“吾将远出，此行未卜归期，汝等要无貽祖羞”。17日凌晨，发现他在家中池塘自尽了，时年65岁。高攀龙从容就义，他说我绝不能落入阉党手里，绝不能被这些人凌辱，所以他选择像屈原那样结束自己生命的



方式。

这是现代的“高攀龙”——邓拓，也是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都当过总编辑的一个人。他在1955年5月，跟几个中央领导参观东林书院的时候，几个人都写了诗，其中他这首写得最好，他说“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下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邓拓他自己1966年5月18日在家里自杀，是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5月18日凌晨是什么概念？前一天是5月17日，5月17日前一天就是5月16日，著名“5·16”通知发布那一年，他以前已经被折腾了很久，但是他还心存侥幸，“5·16”通知一发出来之后，他看完了之后就彻底绝望了，所以17日他写了几封信给各种各样的人做了交代之后，当天晚上待在家里，从他后来留的绝笔信来看，18日凌晨在家里服用安眠药自杀了，这就是他学高攀龙的事。

儒家如何看待生死？在这方面，儒家还是非常人文主义的，他认为人生是有限的，有生必有死，但是谁都不想死，谁都想超越有限，达到无限，都想追求各种各样的意义永恒。所以在这种意义下，儒家怎么解决对死亡的超越？对有限的超越，达到一种永恒的境界。我把它理解为三种策略，第一种也是最普遍、最初级的，就是生儿育女，也就是说，既然我的个体生命不可能有永恒，那怎么办？就是把小我融入到大我里，通过大我的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来延续我的生命，因此对于儒家来说，最初级、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人人可以做到的，就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通过这样让你的生命延续下去，所以儒家也经常讲究慎重追远这些东西。

这是所有的人都要做到的，但是他对于君子有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就是我们说的不朽，做出有利于集体事业的事，借助事业延续自己的生命，生命不可永恒，但是功业是可以永恒的。

儒家最著名的说法就是三不朽，这一段就是《左传》：开封二十四年，鲁国的大夫叔孙豹去晋国出访，就是现在的一个博士访问，晋国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夫，叫范宣子，范宣子一听鲁国的叔孙豹也是一个权贵，两个人都是权贵，都是名人，范宣子就来挑衅，他问叔孙豹，说请问什么叫死而不



朽？叔孙豹没理他，没回答，范宣子就接着说，我家在夏代之前，夏代、商代、东周，包括今天的晋国、春秋时代，我们都是高官显贵、荣华富贵，我家算不算不朽？他主动来挑衅，问叔孙豹，叔孙豹的回答是千古绝唱，说你这个叫“世禄”，世是世世代代的世，禄就是吃皇粮，他说你这就是世世代代吃皇粮，跟不朽没关系，无非你是红二代、红三代之类的，跟不朽没什么关系。紧接着叔孙豹说一段话，他说我告诉你什么叫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最重要的就是虽久不废，就是你死了，你为社会、为人民立得德、立得功、立得言还在造福他人，这就不朽。所以你家世世代代吃皇粮，你们家就是一个世禄，仅此而已，跟不朽没有什么关系。这段话非常有名，“此之谓不朽”。这就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个人他能够追求的，超越死亡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追求不朽。

为什么中国人讲不朽？我们为什么不能仅仅是修身齐家，要治国平天下呢？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做出不朽的事业来，你才能够造福千秋，不但造福很多人，还能够造福千秋万代，这样你才能够超越你有限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融入这个大国当中，不断地延续下去。所以在有生之年，为了超越有限的生命，身后的不朽我们都是需要造福他人，造福社会的，不能仅仅只考虑自己这点小利益，这点是很重要的。

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有生之年还是超越死亡，都要关心他人，关心社会的利益。正是由于不朽的追求，历史在中国的文化中特别重要，如何记录别人的不朽？如何传达和表彰别人的不朽？历史的作用特别重大，中国古代历史和我们今天说的历史学是不一样的，它不仅仅是要客观记录，或者分析、研究它背后的逻辑，它要把道德评价、是非功过的这些评价都注入其中。因此孟子和司马迁都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它的意义不是我们在大学里和研究所面对的历史学，它实际上是与中国人的不朽联系在一起。

我打一个比喻，基督教有末日审判，事实上对于中国儒家来说，历史的审判就是末日审判，流芳百世就是进天堂，遗臭千年就是下地狱。所以功与



名，大家非常重视名声，非常重视脸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文天祥这句话虽然只有 14 个字，但是概括得非常精准和全面，“人生自古谁无死”，他不相信肉体 and 灵魂是永恒的，但是死亡我们是能够超越的，就是做出不朽的事业，不朽事业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彪炳史册，当你进入历史中，并在历史中变成永恒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超越了死亡，达到不朽，或者某种意义的流传，这是很重要的。更高的境界不仅仅是不朽，实际上是天人合一的一个境界。

一个简单的结论，儒家思想的可贵之处，是不依赖灵魂的不朽，而积极的肯定人生，他通过入世而不是出世，超越生死，通过此生的积极作为，践行天道，超越生命的有限，达到永恒，这种永恒不在彼岸，不在天堂，而在此岸，在社会中，在活人的心中，在历史之中，此所谓“不朽”。而“利他”，如果非要说“利他”，“利他”就是达到不朽的唯一途径。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心的宗教，也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公益实践，他可以有力地支持公益实践。

所以我们看，无论是儒家讲的天道，还是儒家所讲的人性，以及君子应有的人生之路，比如说大学之道，还有超越死亡的不朽，他都要求人应当造福他人、造福社会，乃至造福千秋万代。而且造福他人和成就自己根本就没有区别，成就自己就要造福他人，造福他人就是成就自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根本没有必要专门把利他、公益等等拎出来，他与你的一生，与整个理想社会的运行都是不可分离的，是一个水乳交融的东西。

因此我觉得古典儒家的这些思想和资源，对于今天的公益事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东西继承下来，结合当今的社会做出一些恰当的调整，完全可以支持我们今天中国的公益事业。而且我们看，无论是高攀龙的人生实践，还有这样一些先贤的实践，以及中国文化特点，我们会发现古典中国慈善，它是内生的，是这个文明内生的动力，不是外生的动力。它不是一个专业，一个外生出来的部门，也不是说我们正常生活之外生出来的一块。还有它是内在的，既内在与个体的生命，又内在于社会与政治生活。同时，它是离散化的，不是专门化的，它渗透到你人生的各个阶段，生活的



方方面面，社会每个部门里去，他不是一种专业化的东西，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社会局部。它既属于个人，又属于社会，又属于国家，属于天下，各个层面都渗透在其中。

所以我觉得在古典儒家的思想里，一个理想的社会、理想的国家、理想的天下，就是一个大公益的组成。一个理想的人生，肯定是一个非常利他的人生，一个理想的人生，不仅仅包括我们说的一个完整的慈善，但是肯定不能没有这个。也就是说，在儒家中国，你如果不做今天我们所谓的利他慈善事情，肯定是小人，绝对不会被认为是君子。但是我们今天讲的精英就不一样了，我们今天讲的精英很大程度上都是有本事的人，所谓的成功人士，至于说他有没有利他之心，有没有利他的业绩等等，都不重要，但是在古典儒家的世界里，这些东西是必备的，是不可或缺的。

古人写书的时候，他不是按照我们今天所谓研究慈善的眼光和思路，来表达和记录这些思想。这些东西它是分散在各个地方，我们要把他拎出来，再按照今天的意识梳理和整理出来，所以这个事情还是挺难的，挺浪费时间的。至于怎么把这样一些价值观渗透到我们日常运营的组织管理中来，且和现在的慈善方式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方面我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够一起来探讨。

以上是我的思考，谢谢大家！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



社会治理范畴的慈善体现着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

——在“第六期慈善大讲堂”活动上的总结

马卫红

今天特别感谢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能够把一个这么重要的大讲堂安排在深圳大学，邀请慈善领域的重要学者康晓光老师来主讲。实际上今天这个活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益活动，因为在我看来教育就是最大的公益。康老师作为公益界的领军人物，把公益慈善思想传播给大家，非常感谢您！

今天我听完康老师的讲座，有三点想法希望分享给在座的同仁：

第一，今天的社会已经走向了多元价值共存，多元和混乱不一样，多元不等于混乱。某种意义上，多元是一件好事，无法回避。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回应它，怎么样跟它相处，这也是我们做慈善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情。

第二，慈善事业是通过帮助他人，让大家明白自助者天助的道理。慈善不能长期养懒人，短时期的困难可以让别人帮助你，但不可能长期依靠别人帮助去生存。帮助的过程中让受助的人明白自救和自助。在我看来，慈善的核心是让受助人最终依靠自己，自助者天助。我帮助你，你最终还是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责任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点也是康老师刚才讲的，儒家文化当中所特别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做好慈善，首先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做好自己才能帮助他人。康老师从儒家文化讲慈善理念的时候，我就在想，深圳大学的精神在本质上与儒家所提倡的做好自己有一种“神交”，因为我们深圳大学强调的是“自律、自立、自强”，是脚踏实地，特别强调做好自己。同时，我们管理学院的院训是“改变源于成长与责任”，首先强调的是责任，在成长中坚守责任，才能改变世界，才能帮助更多的人。

第三，我认为慈善事业不能只定位在帮助别人，慈善与公益组织重要的定位应该是如何管理公共性。刚才康老师讲高攀龙那个时代，当时慈善在社



会中的作用其实是一种社会秩序的体现。今天我们在社会治理的范畴中做慈善，在我看来是一种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的体现，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种自然秩序、民间秩序和官方秩序之间的架构，探讨共融。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定位不仅提供帮助和服务，更是对公共性管理的贡献。我觉得公益慈善组织在这个管理领域的探索非常重要。

今天慈善业界的朋友比较多，欢迎大家多关注我们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益慈善方向的人才培养和开展的各项活动，我们有专门的本科人才培养体系，欢迎大家多了解，也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感谢康老师的演讲、感谢刘秘书长的安排，谢谢！

马卫红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
SHENZHEN CHARITY ALLIANCE

地址：中国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4 楼

Add.: 4F, CDI Mansion, Jin Hu St. 1st, Yinhu Rd., Luohu District, Shenzhen

邮编 PC : 518029 电话 Tel. : 0755-82470932

电邮 E-mail: scl@szscl.org 网址 Website: <http://www.szscl.org/>